



李正紀

## 壹、前言

聯合國於 1989 年 11 月 20 日通過「兒童權利公約」，並於 1990 年 9 月 2 日生效，為國際人權法上保障兒童（註 1）人權的基本規範。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為強化我國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與國際接軌，乃將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國內法化，於 2014（以下為說明方便，涉及國內法律亦以西元述之）年 6 月 4 日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自同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除於施行法第 2 條明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外；同法第 4 條復規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兒童及少年權利保障之規定，避免兒童及少年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並積極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實現。

公約除就兒童及少年保護訂有一般性原則，如禁止歧視原則（第 2 條）、兒少最佳利益原則（第 3 條）、保障生命權、生存及發展權（第 6 條）、尊重兒少表意

權（第 12 條），並對兒少基本健康與福利、公民權與自由、家庭環境與替代性照顧，促進教育休閒與文化活動為全方位之保障外，對觸法少年在司法制度部分亦有周詳之規範。關於少年司法制度較重要者厥為第 37 條及第 40 條（如附件）。由於條文甚長，本文乃就公約所規範者歸納出幾項原則，並介紹我國少年司法實務，相互參照，以檢視我國少年司法相關法制是否與公約有違背之處，提供參考。

## 貳、司法特別處遇原則

我國早於 1962 年 1 月 31 日即制定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簡稱少事法），就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不走傳統刑事訴訟程序，改以特別之調查審理程序，並以訓誡、保護管束、感化教育等之管訓處分替代刑罰處分，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專責處理。中間歷經多次修正，較重大者為 1997 年 10 月 29 日，「以保護代替管訓，以教養代替處罰」為修法主軸，將原管訓

處分改以更具保護意義之保護處分，除原有之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感化教育之處分外，增加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之安置輔導處分，採多元化之處遇，以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少事法第 1 條），並成立專責之高雄少年（家事）法院（其餘地方仍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處理，以下為說明方便，均以少年法院稱之）。

亦即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繫屬於少年法院後，由少年法院以保護事件處理，對少年該觸法行為，實務上稱為「非行」而不認係「犯罪」。經少年法院調查審理後，再就其非行之需保護性以適合之保護處分代替刑事處分。除非有刑事責任能力之少年合於少事法第 27 條之情形，即其所犯為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事件繫屬少年法院後已滿 20 歲、或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犯罪情節重大，參酌其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將之裁定移送於檢察官，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此時稱為少年刑事案件）由少年法院以刑事訴訟程序施以刑事處分（對少年科處刑罰時，依刑法第 63 條規定，對未滿 18 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少事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對少年宣告褫奪公權及強制工作，均合於公約第 37 條第 1 項第 a 款）外，概以保護事件之程序處理。

而決定有刑事責任能力之少年觸犯刑罰法律行為究應依保護事件之程序或刑事處分之程序處理，係由少年法院為實質審核，稱為少年法院之先議權，是我國就觸

法少年所為之司法處理，合於公約第 40 條第 3 項之規範。

此外，少事法第 69 條前段規定，對於少年犯罪已依第 42 條為保護處分者，不得就同一事件再為刑事追訴或處罰，亦即對少年之保護處分已然替代刑罰之處分，更可彰顯出對少年之司法特別處遇。

另就少年事件之處理，主要係適用少事法，但少事法無法就所有之程序為鉅細靡遺之規定，故於少事法未規定者，則適用其他法律（少事法第 1 條之 1），即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自得適用於少年保護事件。

## 參、程序保障

### 一、罪名告知及法律協助

少事法第 3 條之 1 規定，警察、檢察官、少年調查官、法官於偵查、調查或審理少年事件時，應告知少年犯罪事實或虞犯事由，聽取其陳述，並應告知其有選任輔佐人之權利。少年保護事件就罪名告知之規定較為簡略，未如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般，除告知有選任輔佐人之權利外，尚應告知罪名、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意思而為陳述，及得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等事項，但依少事法第 1 條之 1 規定，自可依該法規定併告知之。另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於 2013 年 1 月 23 日公布修正，於告知被告得選任辯護人時，如其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就此得請求之事項，亦應告知。少事法對此雖尚未規範，但司法院刻正研議修正，亦採此方向。

## 二、法定代理人在場

少年法院法官對於事件之調查，必要時得傳喚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到場（少事法第 21 條第 1 項）。審理期日應傳喚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並通知少年之輔佐人（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是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程序中，少年之法定代理人自有在場之權利。而我國少事法對法定代理人在場不僅係權利，更係義務，此可觀該法第 2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少年法院法官得依職權或依少年調查官之請求發同行書，強制其到場。」自明。即少年法院除強制少年到場外，亦可強制其法定代理人到場，法定代理人自有陪同之義務。另在警察機關偵查階段，少事法雖未設法定代理人陪同在場之規定，但實務上警察機關偵訊時均會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故法定代理人在場權並無問題，對警察機關言，最大的問題反而是法定代理人不願到場警察又無法強制其到場（註 2）。司法院就法定代理人在檢警移送少年法院前之陪同在場制度，業正研修少事法中。

## 三、證據調查

刑事訴訟法關於人證、鑑定、通譯、勘驗、證據保全、搜索及扣押之規定，於少年保護事件性質不相違反者準用之（少事法第 24 條），少年自得在保護事件調查審理中詢問證人。

## 四、無罪推定

刑事訴訟法第十二章證據章在第 154

條定有無罪推定原則及第 156 條有關自白之證據能力、證明力與緘默權等規定，前揭提及少事法第 24 條就少年保護事件有關證據部分係準用刑事訴訟法，乍視之可以直接準用，但刑事訴訟法有關無罪推定等原則係規定於該法證據章中之第一節「通則」，卻不在少事法第 24 條所明文列舉之內，造成適用上之落差。不過在少年司法實務上均認刑事訴訟法證據章「通則」有關無罪推定及自白部分之規定，均適用於少年保護事件。

## 五、拘留為最後手段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6 條規定，少年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年得以裁定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但以不能責付或以責付為顯不適當，而需收容者為限，可知對少年之收容係為最後手段，須不能責付或不宜責付其法定代理人時，方可為之。另關於收容期間，少事法復規定於調查或審理中均不得逾 2 月，如有繼續收容之必要者，延長收容期間不得逾 1 月，並以一次為限。

## 六、尊重隱私

少年保護事件之調查及審理程序均不公開（少事法第 34 條），以保護少年。此外少事法第 83 條復規定：「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依法予以處分。」就任何人均不得揭露

相關少年之訊息有所規範，以保護少年之隱私，規定似很周詳。惟此所謂「由主管機關依法予以處分」卻無相應之實體法規予以處分，致使少事法第 83 條徒具宣示意義，違反者，無從受所謂之「處分」。幸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於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全文修正，在第 69 條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兒童及少年均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違者，媒體負責人依同法第 103 條、一般人依第 89 條予以處罰，方才有實體法上處罰之依據。

另有關少年司法紀錄部分，公約第 37 條、第 40 條雖未明文觸及，惟公約第 40 條已提示「締約國對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依兒童之年齡與對其重返社會，並在社會承擔建設性角色之期待下，促進兒童之尊嚴及價值感，以增強其對他人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我國少年司法為使少年在保護處分執行完畢後能改過自新，以清白之身在社會立足，早於 1976 年 1 月 20 日修正少事法時即增訂第 83 條之 1，明定：「少年受管訓處分或刑之宣告，於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內未再受管訓處分或刑之宣告者，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得使先前所受處分之宣告失其效力，以激勵少年能確實改過遷善。嗣該條於 1997 年 10 月 29 日再次修正為：「少年受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轉介處分執行完畢二年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三年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後，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已將少年在一定期間內未再受宣告之條件予

以刪除，並將原規定之「五年」修正縮短為「二年」或「三年」，同時增訂第 2 項，科予少年法院通知保存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機關塗銷該前科資料之義務，及增訂第 3 項之非為少年本人之利益或經少年本人同意，少年法院及其他任何機關不得提供少年之前科紀錄及資料，違反者要受刑事處罰（少事法第 83 條之 2），以徹底保護少年。

## 肆、成少分離

少年如有收容必要，係收容於少年觀護所，理論上不致與成年人犯（應為 18 歲以上之人，僅為說明方便以成年人犯稱之）同處之情形。但因現少年矯正機構多與看守所、成人監獄合署辦公，致同時收容少年犯與成年人犯之矯正機構能否做到分界收容，將少年與成年人犯完全隔離，為極具困難之任務（註 3）。在法院部分，過去地方法院於辦理收容少年提解時，多與成年人犯共車，少年極易受到影響。為保障收容少年權益，司法院要求各法院於辦理收容中少年提解及候審工作時，應注意落實與羈押中成年人犯分離之原則，庶免少年受成年人犯不當言行之影響：(1)、提解收容少年應與羈押之成年人犯分車提解，如有無法分車提解之情形，亦應有確實之隔離設備或措施。(2)、收容少年於候審期間應與羈押之成年人犯安置於不同之候審室（參司法院 2007 年 5 月 21 日秘台廳少家一字第 0960010763 號函）。

另外經刑事處分之少年受刑人，依監獄行刑法第 3 條之規定，原則應收容於



少年矯正機構執行徒刑，並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之規定，我國設有少年受刑人之專責矯正學校明陽中學，以執行少年所受之刑罰，於立法上固合於公約揭示之被剝奪自由之兒少應與成年犯隔離之原則，但過去在具體實踐中，卻非如此。少年刑事案件之少年受刑人係由檢察官指揮執行其刑罰，過往檢察官係先將少年受刑人送往成人監獄執行，待數個月後（約 1 到 3 個月）才由成人監獄將該少年受刑人移往專責之少年矯正機關明陽中學執行，此舉顯和公約明示之成少分離之規範不符。筆者曾就此為文提出此舉和公約保護少年之意旨相違（註 4），幸獲監察院林雅鋒委員之重視，乃就此和前揭矯正機構合署辦公之議題一併調查。法務部也同時因司法改革國是會議關心而有正面回應，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召開「少年受刑人指揮執行會議」，同意檢察官指揮未滿 18 歲之少年受刑人執行，及雲林、嘉義、臺南、高雄、橋頭、屏東等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少年受刑人執行時，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應逕行移送明陽中學執行，其餘檢察署指揮執行之 18 歲以上，未滿 23 歲少年受刑人，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依「法務部指定各監獄收容受刑人標準表」辦理，請就近指揮執行至轄區監獄（分監）暫時收容，矯正署原則上應責請各監獄（分監）於二週內將上開少年受刑人移送明陽中學執行，並於暫時收容期間落實執行分界收容（註 5）。至此，對公約揭示之成少分離原則，已向前邁進一大步，令人欣慰。

## 伍、處遇多元

公約第 40 條第 4 項規定：「為確保兒童福祉，並合乎其自身狀況與違法情事，應採行多樣化之處置，例如照顧、輔導或監督裁定、諮商輔導、觀護、寄養照顧、教育或職業培訓方案及其他替代機構照顧之方式。」我國就少年保護事件之保護處分內容亦多元，於少年非行之情節輕微時，少年法院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對少年為轉介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輔導、交付法定代理人嚴加管教或告誡之處分之轉向機制外（少事法第 29 條），經認定非行屬實而情節非輕，需對之為保護處分者，法院除得為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並命勞動服務、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處分外，若少年尚染有煙毒或麻醉、迷幻物品成癮，或有酗酒習慣者，得令入相當處所實施禁戒，或少年身體或精神狀態顯有缺陷者，得令入相當處所實施治療（少事法第 42 條），與公約規範之照顧、輔導等替代處遇方式相契。

至少年不服少年法院之裁定，得抗告上級法院；案件確定後，亦得為重新審理之聲請；及其他於事件進行中法院為之安排通譯或法律協助等，在我國少年法制亦均有規範，自不待言，此部分請參閱「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條約專要文件」之記載，於茲不贅。整體而言，我國少年司法在法制面及實務面，多能符合公約之規定。

## 陸、虞犯問題

惟我國少年司法法制與公約並非全然無矛盾之處，爭議之處，就在虞犯問題。

我國對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的 12 歲以上少年設有虞犯制度（註 6），依少事法第 3 條第 2 款規定，包括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經常逃學或逃家者、參加不良組織者、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等 7 目情形，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之虞者，由少年法院依保護事件處理。

至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第 a 款有關「任何兒童，當其作為或不作為未經本國或國際法所禁止時，不得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所指涉者是否即為虞犯，並不明確。單純從條文文字來看，此部分應和我國刑法第 1 條規定之「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之罪刑法定原則相當。惟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 2007 年第 44 屆會議就公約第 2 條之不歧視原則及第 40 條少年司法基本原則進行解釋，提出第 10 號一般性意見，在少年司法中的兒童權利述及：

8. 刑法甚為通常地列入一些條款，將犯有流浪、翹課、出走及其他行為的一些行為問題兒童列為罪犯，而這些問題行為往往是由於心理或社會經濟問題所致。令人尤感關注的問題是，女孩和街頭兒童往往淪為被當作罪犯看待的受害者。這些行為也稱之為「身份罪」，若這些係成年人所為，則不被視為是犯罪。委員會建議，

締約國廢除有關「身份罪」的條款，依法對兒童和成年人實行平等待遇。為此，委員會還提及《利雅德準則》第 56 條，該條闡明如下：「為防止青少年進一步受到污點烙印、傷害和刑事罪行處分，應制定法規，確保凡成年人所做不視為違法或不受刑罰的行為，如為青少年所做，也不視為違法且不受刑事。」

9. 此外，在處置諸如流浪、流落街頭或離家出走之類行為時，應採取實施保護兒童，包括有效支持家長和 / 或其他照管人的措施，以及旨在從根源上解決這種行為的措施（聯結網址 <http://www.cylaw.org.tw/about/crc/28/141>）。

我國官方出版之「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就該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0 號一般性意見，亦為之引述謂：

第 40 條第 2 項第 a 款有關任何兒童，當其作為或不作為未經本國或國際法所禁止時，不得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兒童權利委員會於第 10 號一般性意見指出許多國家之刑事法律仍對未成年人遊蕩、逃學、逃家等「虞犯」行為有所規範；然考量該等行為之肇因多與社會經濟及心理狀態有關。再由於所謂遊蕩、逃學、逃家之虞犯規定，影響對象多為遊童 (street children)、女童、身心障礙兒童、原住民兒童等弱勢群體，將其列為虞犯，有汙名化之意涵。更何況，基於平等權的考量，成年人不為罪或處罰的行為，對兒童而言，亦應平等對待，不構成犯罪或予以處罰。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應廢除與此相關之內國刑罰法令。遊蕩、逃學及逃家問題的兒童，應以其他方法處

理，例如針對問題的根源，提供父母有效的支援等（衛福部社家署「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第 376-377 頁）。

很微妙者，職司我國憲法解釋的司法院大法官於 2009 年 7 月 31 日就少事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3 目規定之虞犯行為做出釋字第 664 號解釋。解釋文謂：「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由少年法院依該法處理之，係為維護虞犯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度，尚難逕認其為違憲；惟該規定仍有涵蓋過廣與不明確之嫌，應儘速檢討改進。」解釋理由書並補充：「少年事件處理法係立法者為保障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所制定之法律（同法第一條、第二條參照）。該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少年經常逃學或逃家，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由少年法院依該法處理之。上開規定將經常逃學、逃家但未犯罪之虞犯少年，與觸犯刑罰法律行為之少年同受少年保護事件之司法審理，係立法者綜合相關因素，為維護虞犯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度，尚難逕認其即屬違憲。」。

即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廢除有關虞犯的條款，依法對兒童和成年人實行平等待遇，但我國大法官則認虞犯規定難指違憲（大法官雖僅就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為解釋，但其他虞犯行為亦未經大法官指為違憲），只是虞犯涵蓋過廣與不明確，應儘速檢討改進。

於此就涉及到一個問題，若國內法之

規定違反公約之規定者，國內法規定之效果如何？我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9 條係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行後 1 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 3 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並應於本法施行後 5 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即國內法並非與公約抵觸者當然無效，而係應儘速立法修正國內法規。

首先虞犯為少事法之法律所明定，且合於虞犯規定者，經少年法院調查審理後亦係以保護處分，而非施以刑罰處分，和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第 a 款，就字面解釋，並未抵觸；但兒童權利委員會一般性意見提出之公約第 2 條對兒童不歧視原則下，基於平等權的考量，成年人不為罪或處罰的行為，對兒童而言，亦應平等對待，不構成犯罪或予以處罰，極具說服力而難以辯駁。蓋縱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之立法目的下（少事法第 1 條），能否因此而違反平等原則，於成年人犯不罰之情形下，卻對此等虞犯少年在保護之大帽子下為司法處遇，不無疑問。

就此應如何解決？考量我國虞犯規定之非行態樣並無法益侵害性，或較刑事犯罪之侵害性為低，筆者建議，若能將所規定之虞犯置於福利法之範疇內處理，應較為妥適，即在保護虞犯少年之思維下，自應先給予福利舉措，而非逕為司法對待。且此並非無立法先例，過去我國對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之兒少，設有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係由福利主管機關對該兒少先為保護安置，再由法院為後續處遇之裁定，嗣認對此從事性交易之兒少係遭受性剝削，而改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仍同由福利主管機關先為保護安置，再由法院為處遇方式之裁定。是過去立法不論認係從事性交易，或現今法律被認係性剝削，均不將此兒少逕由法院處置，而係由福利主管機關先以安置之福利舉措，嗣後再由法院為處遇裁定，就此立法模式，可供我國對虞犯少年處理方式之參考。

## 柒、結論

綜合上述，我國司法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摒棄傳統之刑罰對待思維，採司法特別處遇原則，定有特別之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並設有專責之少年法院，就少年之非行原則上係以保護事件調查審理，再就其非行之需保護性以適合之保護處分代替刑事處分，除有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並命勞動服務、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處分外，並佐以禁戒、治療等多元化處遇方式，針對少年自身狀況與違法情事，採行相應之處置，以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另在司法程序上，對少年權利之保障，舉凡公約所規定之罪名告知、無罪推定、法律扶助、法定代理人

在場、依證據認定、拘留為最後手段、審級救濟、通譯服務、尊重少年隱私等，均有完整之規範，甚且更進一步採取對少年司法紀錄塗銷之措施，使少年得以改過自新，重新立足社會。經檢視後，我國少年司法對少年人權之保障，均能符合公約之規定。當然我國法制並非完美無暇，實務面仍有更為細緻處理之空間，但整體而言，公約規範在我國少年司法領域，應能落實，唯一有爭論者為虞犯問題，亦較難處理。司法院現正研修少事法，對少年虞犯之相關規定重行檢視，並已有具體之修法進程，就虞犯之處理方向係採所謂之「行政先行」制度（註 7），和筆者上開建議對虞犯少年係採全面福利措施不同，即便如此，亦因福利主管機關早已將虞犯少年定位為「司法少年」而不願碰觸，在修法過程中尚有許多障礙要克服；而司法機關亦擔憂虞犯少年若無人處理，未能及時矯治其性格及調整環境，對虞犯少年之成長有不利影響，就在此「行政機關不願接手，司法機關不敢放手」之尷尬情況下，虞犯問題難解，恐會持續多年。如何讓虞犯少年能儘速脫掉司法面紗，早日披上福利外衣，考驗著政府機關的智慧。

（本文作者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庭長）

**關鍵詞：**少年司法、程序保障、成少分離、虞犯

## 註釋

註 1：兒童權利公約所指之兒童，係指未滿 18 歲之人，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則分兒童及少年，所稱兒童，指未滿 12 歲之人；所稱少年，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少年事件處理法所指之兒童則為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人；所稱少年，則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同，因本文僅就少年部分為論述，故以下就司法制度部分，均以少年稱之。

註 2：參監察院林雅鋒委員監察院 106 司調 11 號就檢察官於少年法院先議前，可否依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規定簽發少年拘票案，調查報告第 32 頁。

註 3：監察院已就各矯正機關同時收容少年與成年收容人時，能否將少年與成年人完全隔離之情形，列 106 司調 36 號調查。

註 4：拙著「我國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兒少司法的兩個問題」，2016 年 10 月 7 日，司法周刊第 1819 期。

註 5：監察院林雅鋒委員 106 司調 36 號案，調查報告第 107-108 頁。

註 6：虞犯制度並非我國所獨創，亞洲地區之日本（該國少年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韓國（該國少年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號）亦均有虞犯之規定，僅各國規範要處理之虞犯行為態樣不同。

註 7：即虞犯應先行通報主管機關，由主管機關結合福利、教育、警政、醫學、心理、衛生或其他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經輔導無效果時，再檢具通報事由及輔導紀錄，由該管警察機關移送法院。

## 參考文獻

行政院（2016）。（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條約專要文件）。臺北：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編印。

高玉泉、蔡沛倫（2016）。（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臺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發行。

## 附 件

### 公約第 37 條

締約國應確保：(a) 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對未滿 18 歲之人所犯罪行，不得處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之無期徒刑；(b) 不得非法或恣意剝奪任何兒童之自由。對兒童之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且應為最短之適當時限；(c) 所有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應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性尊嚴應受尊重，並應考慮其年齡之需要加以對待。特別是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應與成年人分別隔離，除非係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而不隔離；除有特殊情況外，此等兒童有權透

過通訊及探視與家人保持聯繫；(d) 所有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有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協助之權利，並有權就其自由被剝奪之合法性，向法院或其他權責、獨立、公正機關提出異議，並要求獲得迅速之決定。

#### 公約第 40 條

1. 締約國對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應確認該等兒童有權獲得符合以下情況之待遇：依兒童之年齡與對其重返社會，並在社會承擔建設性角色之期待下，促進兒童之尊嚴及價值感，以增強其對他人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2. 為達此目的，並鑒於國際文件之相關規定，締約國尤應確保：(a) 任何兒童，當其作為或不作為未經本國或國際法所禁止時，不得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b) 針對被指稱或指控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至少應獲得下列保證：(i) 在依法判定有罪前，應推定為無罪；(ii) 對其被控訴之罪名能夠迅速且直接地被告知，適當情況下經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告知本人，於準備與提出答辯時並獲得法律或其他適當之協助；(iii) 要求有權、獨立且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構迅速依法公正審理，兒童並應獲得法律或其他適當之協助，且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亦應在場，惟經特別考量兒童之年齡或狀況認為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在場不符合兒童最佳利益者除外；(iv) 不得被迫作證或認罪；可詰問或間接詰問對自身不利之證人，並且在平等之條件下，要求對自己有利的證人出庭並接受詰問；(v) 若經認定觸犯刑事法律，對該認定及因此所衍生之處置，有權要求較高層級之權責、獨立、公正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再為審查；(vi) 若使用兒童不瞭解或不會說之語言，應提供免費之通譯；(vii) 在前開程序之所有過程中，應充分尊重兒童之隱私。3. 締約國對於被指稱、指控或確認為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應特別設置適用之法律、程序、機關與機構，尤應：(a) 規定無觸犯刑事能力之最低年齡；(b) 於適當與必要時，制定不對此等兒童訴諸司法程序之措施，惟須充分尊重人權及法律保障。4. 為確保兒童福祉，並合乎其自身狀況與違法情事，應採行多樣化之處置，例如照顧、輔導或監督裁定、諮商輔導、觀護、寄養照顧、教育或職業培訓方案及其他替代機構照顧之方式。